

的受害者與加害者，最終因協助日軍行動而遭盟軍審判。

顧教授另以二〇一五年日韓慰安婦協議為例，說明歷史記憶從未終結，對過去的詮釋永遠在改變。他指出即便日韓雙方於二〇一五年簽署「最終且不可逆」的協議，爭議依舊未解，因真正的和解來自於長期對話與尊重，而非外交表述。他呼籲日本應如德國般，正視歷史負擔，進行「補償」，而非止於「道歉」。

最後，容我提起一段個人的歷史記憶。二〇一八年在顧教授高足陳冠任博士的引介下，我與師友獲邀拜訪顧教授位於劍橋的住所。那晚我們共飲紅酒，討論史學與人生，那頓晚餐正如這本書一般：豐富又令人回味。《不正義的地理學》不迴避歷史矛盾與創傷，而是透過嚴謹的研究與深邃的洞察，讓我們理解戰後至今東亞社會的歷史裂痕為何仍難以融合的狀態，並提供一種可能走向理解與和解的視野。我願推薦所有關心東亞歷史、政治與人道精神的讀者閱讀此書。

導讀

如何閱讀「不正義的地理學」？ ——一個「後轉型正義」的視角

汪宏倫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）

十多年前，當「戰爭」議題還沒有進入臺灣的公共討論、臺灣也還沒有被國際媒體形容為「地表最危險的地方」的時候，筆者編了一本《戰爭與社會》的學術論文集，呼籲學界要把「戰爭」與「戰爭遺緒」（Legacies of war）帶入研究視野，同時也指出，東亞當今的民族主義與歷史記憶問題，包含臺灣的國族認同與統獨爭議在內，其實都是東亞近現代一連串戰爭所殘留下來的未解決遺緒*。十多年後，在二戰結束八十週年之際，喜見顧若鵬教授《不正義的地理學》中譯本在臺灣出版，心有戚戚

*參見汪宏倫，二〇一四，《戰爭與社會：理論、歷史、主體經驗》，共六四八頁，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。

焉，因為這正是一部以跨國視角深入探討東亞戰爭遺緒的重量級著作。

顧若鵬教授目前執教於英國劍橋大學東亞學系，他的前一部著作《從人到鬼，從鬼到人：日本戰犯與中國的審判》獲得美國歷史學會的費正清獎，奠定其學術地位。本書可以說是前一部作品的擴大與延伸，涵蓋內容更廣、論點也更深入。筆者有幸在本書付梓之前，就得以先睹為快，拜讀本書的英文初稿。當時原稿的書名是：*The Geography of Injustice in Postwar East Asia: Japan and Its Neighbors*。顧名思義，本書的初衷是要以日本為中心，探討戰後東亞「不正義的地理學」。這個標題頗具巧思，而且兩個主要關鍵字「不正義」與「地理學」，均寓有深意。首先，本書處理的中心議題是戰罪審判，按理說是關於「正義」的實現，但書名卻巧妙選用了一個反義字：不正義（injustice）。換句話說，透過這些案例，作者所親眼目睹見證的，不是正義，而是不正義。再者，這個不正義是有「地理學」意涵的，因為它環繞著日本而開展，呈現出既有時間的歷史縱深、又有空間的地理分布的複雜景觀。東亞戰後的不正義散布於不同的地區，無論在日本、中國、臺灣及南北韓，都可見到戰後不正義的遺緒——而且這個地理的區隔與劃分（例如兩岸與朝鮮半島的分隔），背後也隱含許多因為政治權力競逐而導致的不正義。

在這樣的企圖下，本書先從日本戰後的東亞萬象開始談起，接著在第二章帶出本書的主要論旨：要理解東亞戰後局勢與其後的發展，採取「以西方為中心的冷戰視角」是遠遠不足，甚至是相當誤導的。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，日本的戰敗雖然給日本本土帶來了和平，但日本帝國曾經占領過的周邊領土，卻反而陷入了混亂與暴力之中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作者帶入了戰罪審判與「競爭性正義」的主題，考察戰後各國的行動者對正義的不同想像與競逐，分析戰犯審判如何影響到戰後重建及歷史記憶。這些深遠的影響，到今日都仍持續可見。順著這個主題，作者在接下來的章節中考察了戰罪審判、戰爭責任的追究、歷史詮釋的爭奪、戰爭紀念與記憶的爭議，從日本及帝國邊陲（臺灣與朝鮮）一路寫到中國（包含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），從戰後一路寫到當代，最後則是對試圖操弄歷史與記憶的政治野心提出警告。

在當前東亞記憶政治與地緣秩序劇烈轉變的局勢下，這本書無疑是一部挑戰主流「歷史正義」想像的重要著作。相較於將戰犯審判視為正義伸張、歷史終結的象徵，作者反其道而行，提醒我們：歷史尚在進行，正義並未完成，記憶永遠處於爭奪與重寫之中。透過龐大的檔案與文書，乃至個人訪談與親身經歷，本書考察了東亞在戰後對戰犯審判的各種實踐與記憶，包括中國的瀋陽與撫順法庭、日本對審判結果的集體遺忘、韓國對親日份子的歷史模糊，以及國際社會對於東京審判的分歧回應等。這些案例證明：「正義」的實踐方式與歷史解釋之間並無單一解方，它們往往深深鑲嵌在國族認同、外交政策與文化政治的鬥爭中。

臺灣在本書當中所占篇幅不算多，但作者特地為中譯本寫了一篇「臺灣版序言」，看得出顧教授

對臺灣做了不少功課，也給足臺灣讀者面子。在這篇委婉而友善的序言中，作者含蓄點出了臺灣所經歷的歷史弔詭與當前面臨的困局，並以「戰後正義的悖論」稱之。書中第六章提到了臺灣的二二八與韓國的濟州事件，並將之放在「戰後東亞的（不）正義網絡」中來分析，視之為帝國解體與戰後復員時期所產生的混亂與暴力衝突事件。這對近年來熱中追求「轉型正義」的臺灣來說，倒是饒富啟示意義。

過去三十年來，學界刮起了一股「轉型正義」的風潮，把二戰以來的戰犯審判、民主轉型、衝突化解與和平構築，一股腦全部放在「轉型正義」的框架下面來討論。對於這股趨勢，專研戰犯審判的顧教授，顯然有不同意見。他在本書第二章裡面寫道：

「轉型正義」是眾所周知的觀念，它的核心就是：在一個統一的領土內，在同一群擁有共通語言、相對來說擁有相同政治觀點或至少是相同未來目標的人群中，以司法手段來結案。然而，當我們用比較宏觀的視角來看東亞地區史，就會發現前述框架並不合用。這片地理空間極其廣大，當中舉行過太多場審判，在無數統治勢力間製造出非常不同的動態變化。

在筆者看來，顧教授對轉型正義的這段評述似乎有點過於含蓄，但對臺灣的讀者來說已經具有足

夠的啟發。根據本書所呈現的多視角考察，我們發現，正義是不斷處於競逐的狀態中，即使是號稱恢復「戰後正義」的戰犯審判亦然。作者特別提出警告：「如果我們過度強調國族史（national history，本書譯為「國別史」）以及國族史／國別史與正義的關聯，我們就會自我蒙蔽，看不見整個地區發生的事」*。這對於許多熱中於「轉型正義」的人來說，無異是深具警示意涵的暮鼓晨鐘。

對當代臺灣讀者而言，這本書提供的不僅是一面他者的鏡子，更是一面自我反思的窗口。過去幾年來，「轉型正義」在臺灣政治語言中被高度制度化與道德化，其背後所預設的是：歷史真相可以釐清、正義可以實現、國族創傷可以藉由「平復不法」得到撫平。然而，顧教授的研究提醒我們，這種法庭式的正義觀，往往掩蓋了歷史本身的開放性與政治性，也容易將歷史敘事轉變為統治語言。

二〇二三年春，顧教授短暫訪問臺灣，以本書初稿為主題在政大發表演講，筆者有幸躬逢其盛。在會後餐敘時，雙方聊起共同關心的戰爭遺緒及「轉型正義」等話題，筆者半開玩笑地說自己正在努力嘗試「拆解轉型正義」（undo transitional justice），因為此前筆者發表了批評轉型正義的論文而引發爭議。顧教授聞言後哈哈大笑，勸筆者別傻了，因為轉型正義已經成為一個盤根錯節的全球建制

* National history 在這裡的兩義性，值得提出來強調。一方面，「國族史」企圖以歷史來證成國族，一方面，「國別史」則使人把焦點局限在單一國內，卻看不到地區與全球的脈絡。

(deeply entrenched global enterprise)，難以撼動。顧教授說的完全沒錯，儘管批評者眾，「轉型正義」已經發展成一個跨越國境的全球事業，既不可能拆解，也難以僅憑少數人之力撼動。在臺灣，歷經民間倡議與民進黨政府的推動，「轉型正義」也已經挾「龐大公務體系與各級教育」之力，深入臺灣社會，成為不可置疑的「政治正確」。在此情形下，要「拆解轉型正義」，猶如一樁「不可能的任務」。既然已經做的無法重來，筆者只能呼籲並期待，臺灣社會能夠向「後轉型正義」的階段邁進，而這本正是開啟我們「後轉型正義」視角的一個重要助力。

在本書的「臺灣版序言」及第十二章，顧教授都簡略提到了臺灣的「轉型正義」，但並未深入評析。這點無需苛求，畢竟在這本企圖宏大的書裡面，本來就不可能鉅細靡遺、面面俱到*。顧教授本人可能也從未想過，本書的其他章節，對思考臺灣的「轉型正義」，其實具有莫大的啟示。對臺灣讀者來說，本書最可貴的訊息，在於告訴我們，歷史從未抵達終點；無論是要「超克過去」，還是要「共創未來」，臺灣都必須跳脫「國族史」的框架，把自己放在日本帝國解體之後的東亞「不正義的地理學」脈絡中來思考，既不能脫離歷史與地緣政治的脈絡†，也不能以「一刀切」的方式來理解過去發生的種種「不正義」——不幸的是，這兩個面向，都是臺灣過去在推動「轉型正義」時所忽略的。我們需要做的，是不斷地審視過去、盱衡未來，不要妄想「一步到位」，以為透過「轉型正義」或類似的手段，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過去歷史所遺留下來的艱難問題——包含戰爭與戰爭遺緒。作者批評

「以冷戰思維來理解戰後東亞」，是西方中心的看法；同樣地，以冷戰結束、歷史終結為前提，標榜「普世價值」、「放諸四海皆準」的「轉型正義」，其實也是如此。所謂「正義」，從來不是超越政治的純粹倫理，而是在各方競逐下，透過形形色色的鬥爭與妥協所產生的語言與實踐。審判不是真理的實現，而是權力的展演；國族歷史不是過去的忠實再現，而是各方記憶的修羅場。若將「轉型正義」視為歷史終點的「最後審判」，那我們終將發現，正義的幻影只會招致新的排除、仇恨與對立。

因此，本書帶給臺灣讀者的巨大啟示之一，不是「如何完成正義」，而是「如何理解不義」；我們需要建立一種允許記憶差異、歷史辯論與政治對話持續發生的民主文化空間，而非急於封存歷史爭

* 不過，基於職責，筆者不得不指出本書英文原版裡面一個微小但明顯的錯誤：蔡英文總統成立的不是「真相與和解委員會」(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ttee)，而是「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」(Transitional Justice Commission)，作者似乎將之與民間發起的「真相與和解促進會」混淆了——所幸這個錯誤在中譯本裡面已經改正。名稱問題在這裡至關重要，並非瑣碎之事。假如蔡政府當初打的旗號是「真相與和解」而不是「轉型正義」，可能後來走的方向會非常不一樣，招致的反彈與批評或許也不會那麼多。參見拙著〈要「超克過去」，不是「轉型正義」——對三篇評論的回應〉，《台灣社會學》第四十九期(二〇二五)，頁一七九至二一七。

† 儘管本書討論的主要是「不正義的地理學」，但作者的分析也多少觸及了一部分東亞的地緣政治因素。因此，筆者認為我們可以往前推進一步，探討「不正義的地緣政治」(geopolitics of injustice)。事實上，台灣當前所面臨的國族問題與戰爭風險，正是「不正義的地緣政治」的具體寫照。

議，打造道德高地。這本書的重要貢獻，即在於它為當代東亞與臺灣社會提供一種超越審判語言的新視野：正義不是終點，而是過程；不是答案，而是問題；不是結束，而是開始。這樣的觀點，不僅能協助我們更清醒地理解國族與記憶的鬥爭，也為我們提供一種遠離道德教條、走向開放歷史政治想像的可能性。與其盲目相信一個烏托邦式的全球普世正義，甚至「自以為義」，不如先學會「如何閱讀不正義」。

本書獻給和尚さん和典子，如果沒有你們的真摯情感與溫暖家園，我永遠不會踏上這條研究東亞歷史之路。這一切，以及更多的事，都要感謝你們如此大方好客，以及數十年來對我從不間斷的支持。